

丁玲与鲁迅的文坛交往

“如磐遥夜拥重楼,翦柳春风导九秋。湘瑟凝尘清怨绝,可怜无女耀高丘。”这是 1933 年 6 月鲁迅误以为丁玲遇害时写的诗,表达了他对丁玲“去世”的悲痛。丁玲与鲁迅见面不多,但深受其影响。

丁玲向鲁迅求教

丁玲 1904 年出生于湖南临澧,4 岁时父亲去世,在母亲的启蒙下,她从小便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。五四运动爆发时,丁玲正在读中学,她如饥似渴地阅读《新青年》等新潮杂志,还剪掉辫子,参加了湖南“驱张运动”。

鲁迅是《新青年》杂志的“主将”,丁玲那时就读过他的短篇小说,只是还没有引起她的特别注意。后来,丁玲来到平民女学、上海大学读书,认识了瞿秋白、施存统、柯庆施等共产党员。此后,她离开上海,成为“北漂”。在此期间,丁玲开始大量阅读鲁迅作品,她后来回忆道:

“鲁迅”成了两个特大的字,在我心头闪烁。我寻找过去被我疏忽了的那些深刻的篇章,我从那里认识真正的中国……鲁迅,他怎能这么体贴人情,细致、尖锐、深刻地把中国社会,把中国人解剖得这样清楚……鲁迅,真是一个非凡的人吧!我这样想。如饥似渴地寻找他的小说、杂文,翻旧杂志,买刚出版的新书,一篇也不愿漏掉在《京报副刊》《语丝》上登载的他的文章,我总想多读到一些,多知道一些,他成了唯一安慰我的人。

当时的丁玲非常苦闷,生活没有着落,不知人生该何去何从,于是便“带着

无边的勇气 and 希望”写了一封信向鲁迅求教。当时情况特殊,鲁迅以为丁玲的信是某人化名所写,所以一直没有回信。

后来得知真相,并听说丁玲已回老家湖南后,鲁迅很抱歉地说:“她赶着回湖南老家,那一定是在北京活不下去了。青年人大半是不愿回老家的。她竟回老家,可见是抱着痛苦回去的。她那封信,我没有回她,倒觉得不舒服。”

鲁迅没有回信,并没有影响丁玲对他的崇拜,她继续阅读鲁迅作品,特别是鲁迅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,并关注着鲁迅和创造社等的论战。她回忆道:“眼看着鲁迅既要反对当权的国民党的新贵,反对复古派……还要不时回过头来,招架从自己营垒里横来的刀斧和射来的暗箭,我心里为之不平。我又为鲁迅的战斗不已的革命锋芒和韧性而心折。而他还在酣战的空隙里,大力介绍、传播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。我读这些书时,感到受益很多,对鲁迅在实践和宣传革命文艺理论上的贡献,更是倍加崇敬。我注视他发表的各种长短文章,我丝毫没有因为他不曾回我的信而受到的委屈影响我对他的崇拜。我把他指的方向当作自己努力的方向,在写作的途中,逐渐拨正自己的航向。”

鲁迅写下《悼丁君》诗

发表《梦珂》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《韦护》等作品后,丁玲在文坛已小有名气。“当我知道了鲁迅参加并领导左翼作家联盟工作时,我是如何的激动啊!我认为这个联盟一定是最革命最正确的作家组织了。”所以丁玲受邀加

入了“左联”,主持机关刊物《北斗》。

鲁迅给了丁玲很多支持,在《北斗》先后发表了十多篇杂文、译文,还将《北斗》赠送给日本朋友。

1931 年 5 月,丁玲在参加“左联”会议时第一次见到了鲁迅,50 年后她回忆道:

会开始不久,鲁迅来了,他迟到了。他穿一件黑色长袍,着一双黑色球鞋,短的黑发和浓厚的胡髭中间闪烁的是一双铮铮锋利的眼睛,然而在这样一张威严肃穆的脸上却现出一副极为天真的神情,像一个小孩犯了小小错误,微微带点抱歉的羞涩的表情。我不须问,好像他同我是很熟的人似的,我用亲切的眼光随着他的行动,送他坐在他的座位上。

1931 年 7 月,丁玲去鲁迅家拜访。鲁迅对她的印象是“丁玲还像一个小孩子”。她曾对鲁迅说,自己有脾气,不好。鲁迅说:“有脾气有什么不好?人嘛,总应该有点脾气的。我也是有脾气的,有时候,我还觉得有脾气也很好。”

1933 年 5 月,丁玲在家中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,从此被软禁于南京等地达三年之久。丁玲被捕后,鲁迅很愤慨,联合宋庆龄、蔡元培等知名人士向国民党当局抗争。后来,鲁迅一度以为丁玲像外界传说的那样遇害,于是在 1933 年 6 月 28 日写下了《悼丁君》诗,并公开发表于《涛声》周刊。6 月 30 日,他在文章《我的种痘》中写道:“整整的五十年,从地球年龄来计算,真是微乎其微,然而从人类历史上说,却已经是半世纪,柔石丁玲他们,就活不到这么久。”8 月 1 日,他又在致科学新闻社的信中说:“至于丁玲,毫无消息,据我看来,是已经被害的了,而有些刊物还造许多关于她的谣言。”

1934 年,鲁迅与茅盾编选英译本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《草鞋脚》时,收录了丁玲的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和《水》。他还建议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尽快出版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《母亲》,“书出得越快

越好。出版时要在各大报上大登广告,大事宣传,这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斗争方式”。

著名作家唐弢在 1986 年回忆说:“我记得鲁迅先生是这样谈到丁玲同志的:他说,按照她的性格,决不会安于南京那样的生活,她会反抗的……”可见,鲁迅不认为被软禁的丁玲如传闻所言“变节自首”,反而还比较赞许她。

“左联”成员吴山在《铁篷车中追悼鲁迅记》也记载,鲁迅在谈及几位被捕的作家时说:“只有丁玲的态度还算不错,她始终不屈地保持着沉默。”

“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”

1936 年秋,丁玲逃离软禁后,得知鲁迅的关心和信任,她非常感动,“我真感谢鲁迅并没有因为一些谣言或传说而对我有所谴责”。丁玲想去看望鲁迅,但听说鲁迅身体很不好,不宜见客,她便写了一封信问候。1936 年 10 月 20 日,丁玲从报纸上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,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,其中写道:

我两次到上海,均万分想同他见一次,但因为环境的不许可,只能让我悬想他的病躯,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精神!……此刻却传来如此的噩耗,我简直不能述说我的无救的缺憾了……这哀恸真是属于我们大众的,我们只有拼命努力来纪念着这世界上的一颗陨落了巨星,是中国最光荣的一颗巨星!

这封信署名“耀高丘”,便取自鲁迅《悼丁君》诗中的“可怜无女耀高丘”。

1941 年 10 月,在鲁迅逝世五周年之际,丁玲写文章纪念道:“今天我以为最好学习他的坚定的永远的面向着真理,为真理敢说,不怕一切。”新中国成立后,丁玲创办了中央文学研究所,即现在鲁迅文学院的前身,亦是她和鲁迅的另一种“缘分”。后来,她又详细回顾了自己与鲁迅的“渊源”:“鲁迅先生说他自己吃的是草,挤出来的是奶。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,以至于成熟起来的。”据《同舟共进》张守涛/文

给皇帝看病就像玩“攻防游戏”

杜钟骏是晚清时期的一名候补知县,号称擅长医道,故被人举荐入宫给光绪皇帝看病。他后来留下了一篇回忆文字《德宗请脉记》,里面说,自己在诊病之前,已深知慈禧和光绪的忌讳:“皇太后恶人说皇上肝郁,皇上恶人说自己肾亏,予故避之。”

一个人“肝郁”,往往是因为他的心情长期不愉快。能让光绪皇帝不愉快的自然只会是慈禧,而慈禧绝不愿承认自己在迫害光绪。一个人“肾亏”,则往往意味着他不够阳刚,有损皇帝的光辉形象。所以,当着慈禧的面给光绪诊病时,杜钟骏小心翼翼地避开了“肝郁”与“肾亏”这些名词。

在“给皇帝看病”这件事情上,讳疾忌医其实只是小事,最要紧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前程。

为了趋利避害、规避皇权的惩罚,历代御医们都练就了一套“不求有功、但求无过”的高超本领。

他们热衷于开无风险的补药,而非治病之药;热衷于用“慢治”卸责,而讳言药到病除;热衷于“从众诊断”,绝不说和其他人不一样的话,如此就可以处在安全位置。

这些,而非医术,才是御医们必

修的核心“职业技能”。

皇帝当然也不傻。为了反制御医们的这种手段,晚清的紫禁城发明了一种“轮诊制度”,简单说来就是以若干天数(比如 5 天或者 10 天)为一个周期,每天让一名医生前来诊病,让他单独写出自己的诊断意见和药方,不许医生们彼此交流。最后由皇帝和大臣们来判断谁的诊断和药方是可信的。

这种对御医的不信任,和御医对专业决策权的甘愿让渡,发展到极致,往往就会变成皇帝自己出手更改药方。慈禧和光绪都干过这种事情。慈禧曾将名医薛宝田拟定药方里的“续断”擅自改为“当归”。光绪经常改动医生开的药方,比如擅自往里面加入乳香、紫花地丁、白芷,或圈掉药方里的杜仲和菟丝子,有时候还会直接下旨对御医进行业务指导,教他们怎么玩“君臣相佐。”

如此这般,皇帝与他的医生们就陷入一种漫长的死循环中。皇帝无法信任医生,医生也不敢给皇帝提供关于疾病的独立见解。双方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医患关系,而更像是在玩一种两败俱伤的攻防游戏。据《各界》隋林/文